

·开栏的话

应《文艺报》之邀开设“编辑故事”专栏，全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凤凰文艺出版社和《文艺报》编辑的“合谋”。

之所以不想开，一是因为自感能力不足。我从来没有开设过栏目，只知道熟悉的丁帆、王尧、何平在报刊开设专栏，他们都是名家，而我是鼠辈；二是因为我自感精力不足。

既开之则安之，我想先开一年再说。

至于栏目，我初步想设立如下几栏：1.名编说名编；2.做透一本书；3.转行做编辑；4.编辑甘与苦；5.选题论证会；6.作者与编者；7.一生做嫁衣；8.未能出的书。

本期时间紧，我偷了一次懒。“名编说名编”直接选用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追忆上海出版名家巢峰的文章。巢老是全国顶尖的出版名家，又是陈昕这位名家的“提携者”，符合“名编说名编”的栏目特点。

文章只写自己的事，不写别人的事。越生动、越有趣、越真诚，我越欢迎。我不喜欢谈无趣的文章，假大空文章尤其厌恶。



陈昕

一代出版家巢峰远行了

□陈昕

差不多在七八年前，巢峰同志就因病长住医院了。我退休后常去医院与他聊天叙旧，看着他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心中尽是悲伤的情绪。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

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那时我刚刚加入上海经济学会，巢峰同志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巢峰同志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较早将消费列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者，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生产必须在消费中完成。”

巢峰同志以其丰富的政治历练和厚实的专业素养投身中国的出版事业，他曾执掌过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大社。

改革是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潮，几十年间大潮迭起，而他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工作。他熟知当代国际出版业购并、重组的外在趋势与内在动力，认定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出版改革步入市场化的重要方向。

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他目光远大，宿卷天高，是《辞海》《大辞海》这样的关系到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之一。

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他目光远大，宿卷天高，是《辞海》《大辞海》这样的关系到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之一。

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他目光远大，宿卷天高，是《辞海》《大辞海》这样的关系到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之一。

好书的生命力量

□陈叶

2022年底，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公布，译林社《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获此殊荣。三年来，这本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作者和传主的灵魂相契。本书传主樊锦诗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莫高窟守护者，作者顾春芳是风华正茂的北大学者。

在获颁“中国好书”荣誉时，樊先生深情地说：“我在敦煌待了五十七年了，见证了莫高窟的巨变，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无怨无悔的奉献，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莫高窟人的精神告诉世人。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编者和作者的精诚合作。早在2016年，我们同北京大学叶朗先生主持的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洽谈项目合作，闲聊间无意得知中心正在进行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项目。

2019年6月，第一个喜讯传来，《我心归处是敦煌》被列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此时樊先生正和顾教授一起躲在北大的一个宾馆里，以考古学人的严谨态度逐字逐句地校稿。

虽然时间极为紧张，我们也没有放弃对装帧细节的追求。顾教授请资深摄影师孙志军老师专门为樊先生拍摄了封面照，又请书法界泰斗沈鹏先生为内封题写了书名。

这段和作者们并肩战斗的经历，成为了我和陆晨希编辑生涯中最难忘的篇章，也让我们和两位作者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宣传营销的深度推广。《我心归处是敦煌》是一部意蕴深厚的作品，围绕这一产品的特性，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译林社营销团队和编辑团队紧密配合。

从2019年9月底到10月初，紧随着这本书的上市铺货，一个个喜讯接踵而至：樊先生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至12月底，各大年度好书榜单的助力使得营销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渠道下沉，营销细化，走进校园。我们发起了向全国老师赠书的活动。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创新模式的多维度开发。我们充分调动全社各部门的资源力量，从立项之初就周密计划，以“敦煌×樊锦诗”的IP模式来进行多维度打造。

如今，译林社仍在进行敦煌主题图书的少儿化、梯队化拓展，2022年10月，在《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三周年之际，顾春芳教授以莫高窟为背景创作的少女奇幻小说《敦煌灵兽》与小读者们见面。

樊锦诗先生用“数字敦煌”的科技创新理念使千年莫高窟得到了永生，一本好书的生命力量，也能够通过这些源源不断的创新融合实践中获得永恒。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

当阅读从爱好变成工作

□曾恺

从开始做编辑的那一刻算起，我进入出版业已经快九年。九年，正好是义务教育的学年，是把一个懵懂的孩童教育为初步形成自我价值取向的青少年的法定年份。

从报社到出版社，从output到input

在做图书编辑之前，我是一名记者，终日奔跑在新闻现场，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事、写不同的报道。

有些事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我辞职半年之际，正在张家界的大山里，报社同事给我发来了凤凰出版集团的招聘消息。

真正来到了出版社，对我冲击力最大的是工作模式的转换——从output到input。做记者时，我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信息转换成新闻稿。

出版社的工作是一份持续的输入(input)状态，编辑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的自觉，学习包括而不仅限于当下编辑的文稿本身。

责任编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做记者有记者证，做图书编辑也有图书编辑证。入职一年后，我如愿持证上岗，能真正在书上署名“责任编辑”，至于这个“责任”二字到底意味几何，我也是在工作中才逐步了解。

很多人确实对“图书编辑”的工作内容有很多枯燥或浪漫的理想，比如认为编辑就是找错别字的；或者认为编辑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新媒体营销兴起后，编辑又似乎成了朋友圈疯狂转发卖书的人。

编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想用“产品经理”来解释最合适，编辑是为终端用户（即读者）服务，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图书编印发）的人。

做一本图书就好像朝虚空里扔了一个漂流瓶，你不知道它会抵达哪里，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引发波动。

又会带着别的信息回到自己手上。

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漂流瓶。在《我们深圳四十年》新书发布会的现场，我碰到了看到目录便轻轻吟唱的读者，那是因为这本带个人色彩的主题读物，采用编年体形式。

一本书被看到、被理解甚至被误读，都有思想在流动，而编辑最终的“责任”就是不曲解地呈现作者的意见。

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面对“有无价值”的拷问

选择做记者和选择做图书编辑的理由一样，我喜欢和这个世界直接产生关系。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需要经受的折磨是，你必须问一问自己：你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

做编辑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是一份获取劳动报酬的工作，一个能与人发生思想连接的物质载体，一种终身学习吸收未知的习惯；甚至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习气——让我精神和躯体都十分“突出”——信仰科学与知识，以及承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带来的疼痛。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